

试析宋代人口南迁及其对南方的影响

王宝平

(许昌理工学校,河南 许昌 461700)

摘要:在宋代,由于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北方人口大规模地向南迁移,移民中包括皇室、贵族、平民百姓等各个阶层,这不仅使长期以来的人口重心彻底南移,而且对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宋代;人口南迁;南方;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864 (2010) 01-0049-03

宋代,由于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北方人口大规模地向南迁移,移民中包括皇室、贵族、平民百姓等,这不仅使长期以来的人口重心彻底南移,而且对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一、宋代人口南迁的原因及移民构成

1. 宋代人口南迁的原因。

北宋末年到南宋末年的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战争频仍,以河南、山东为主,兼及山西、陕西、淮北等北方居民的田园被毁,生计没有着落,被迫流落在外,大批迁入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北方不少地区甚至“州县皆空”^[1],而南方则“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2]。可以说,频繁战争是导致宋代人口大规模南迁的最直接因素。1138年,宋室南渡,政治中心南移,加剧了人口南迁这一进程。此外,政府对于北方移民采取积极招徕和安抚政策,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北方人口南迁的规模。以上这些都可以说是促使宋代北民南迁的政治因素。

黄河中下游地区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人口多集中分布在此。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迅速增长,人多地少这一现象在隋代初现端倪。《隋书·食货志》记载:“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人们为了寻求生活空间,纷纷向地广人稀的南方迁移。唐代,这一趋势更加严重。北宋年间,北方人口仍呈南迁态势,北民南迁这一现象已载见诸多史籍。北宋文学家、诗人苏轼针对这一现象曾说:“吴、蜀有可耕地之人,而无其地”;苏辙也说:“吴越巴蜀之间,拳肩侧足,以争寻常尺寸之地。”当时东南地区平原地带已无闲田,也无隙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宋代人口大规模南迁是自隋唐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发展的确定趋势,具有不可回归和不可逆转性。这是宋代人口南迁的经济因素。

上,宋代人口大规模南迁是自隋唐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发展的确定趋势,具有不可回归和不可逆转性。这是宋代人口南迁的经济因素。

2. 北方迁往南方的移民构成

宋代,由北方迁往南方的移民成分极其复杂,既有阶层、职业和贫富的不同,又有民族的区别。第一类是统治集团中的成员,从皇帝、后妃、外戚到文武百官及其家属。这些人大多是在靖康之变时就率先南逃的,虽然人数不多,但由于他们的特殊社会地位,对以后南方的政治、文化生活及社会习俗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二类是原驻扎在北方的士兵及其家族,大多是扈从高宗而逃往南方的,约有5万人。第三类是在宋金或宋蒙战争期间,为躲避战乱而逃往南方的普通百姓,其中又以地主、商人为多。如靖康之变前后,河南、山东等地的有产者,“率鬻田宅,去乡里”^[3],纷纷南迁。第四类是部分北方义兵,以及由平民、士兵和义兵转化为游寇的人。如曾经战斗在太行山、河东一带的八字军和红巾军,在他们遭到金人镇压受挫后,一部分人转战回到南方。最后一类是所谓的归正人,指原来在别的政权统治下的百姓、官员或首领,他们或者为了摆脱异族的统治或奴役,或者是受南宋政府的招引而内附的人。归正人只是一个统称,其成分十分复杂,既有北方汉人,也有女真、契丹、吐蕃等少数民族的人。

二、宋代人口南迁对南方的影响

1. 使中国人口重心彻底南移

从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口比重基本上一直高于南方人口比重。隋唐之际,北方战乱对人口影响甚大,唐代初年南方人口占54.6%,北方占45.4%,南方人口首次

收稿日期:2009-11-26

作者简介:王宝平(1965-),男,河南襄城人,许昌理工学校讲师。

超过北方。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受战乱的影响较大,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北宋初年,南方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0.4%,北方人口占39.6%。到元丰年间,中国南方人口不论是从人口数量还是人口密度方面都超过了北方。1162年,南方各府路共有11541629户,全国共有18331078户,南方地区人口就户数而言占全国的63%,表明近2/3的人口分布在中国南方地区^[4]。13世纪初,南方人口占了全国的69%,北方只占31%,南方地区的人口密度大大增加。

2 改变了南宋的政治构成

由于移民中有统治集团中的成员,如皇帝、后妃、大臣等,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对宋代的政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首先,北方移民构成了南宋军队的主体。众所周知,北宋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兵力配备上实行的是“内外相制”的方针,加上为了抵御辽、西夏和金的需要,全国禁军绝大部分都驻扎在北方。靖康初年,汴京遭金兵包围,全国禁军都奉命前往“勤王”,因此,当时南方几乎没有禁军可言。北方人尚武,善于骑射,禁军主力基本上也是由北方人民所组成。

宋室南渡以后,其主要将领几乎全是北方人,如刘光世、韩世忠、岳飞、张俊等,另外朝廷赖以支持抗金的内外大军的主力也来自于北方人民。绍兴七年(1137),金废刘豫政权,赵鼎乘机派人往河南进行招抚,原伪齐统治区的军民大批逃往南宋。另据绍兴八年(1138)二月刘锜奏称:“淮北归正者不绝,度今岁可得四五万众”。高宗因此欣喜异常,他说:“朕常虑江、池数百里备御空虚,今得此军可无患矣。”^[5]绍兴三十二年(1162),张俊对北方人民参加南宋军队一事曾做过高度的评价,他说:“国家自南渡以来,兵单士弱,赖山西及东北之人不忘本朝,率众归附,以数万计。臣自为御营参赞军事,目所亲见,后之良将精兵,往往当时归正人也。三十余年捍御力战,国势以安。”^[6]

不仅整个高宗朝如此,后来的南宋军队同样也受到了重大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怯弱南兵,不足为用”,必须依靠由北方人组成的军队,另一方面是直到南宋中后期,仍有大量北方移民南迁,宋廷将他们或补充南宋御前诸军,或另组新军。

其次,重用南方士大夫。宋朝本是以中原王朝为基础,平定南方各割据政权以后建立起来的全国性统一政权。基于这种历史根源,在宋初,对包括科举出身者在内的南方士大夫,往往采取排斥态度,很少予以重任。到仁宗朝,宋已有天下60余年,随着南北之间隔阂的渐渐消失,排斥南方士大夫的现象才告结束。北宋后期,由于南方士人在进士科考试中越来越占有优势,以致南方人在朝廷中的地位反而超过了北方人。

靖康之变后,北方士大夫大量南迁,高宗对他们也极力加以重用,如吕颐浩、赵鼎等。但是,在南方的政治气候

和社会环境中,重用北方士大夫的现象迅速被改变,正如李椿在孝宗朝所说:“自太上皇帝南渡艰难之时,任吕颐浩,所以能诛逆臣,破草寇,……可谓有大功劳。及叛臣挟虏势,侵犯淮甸,太上皇帝用赵鼎,遣诸将破虏军,而后国势张,宗社固,天下翕然归重,此二人也,皆北人也。……自二臣迁废死亡,其家皆破碎,北人立朝者殆鲜。”^[7]据今人统计,高宗朝有籍贯可考的80名宰执中,北方移民有34人,占42.5%,南方人占57.5%,自孝宗以后,移民及其后裔出任宰执的比率进一步减少:孝宗朝为25.5%,光宗、宁宗朝为15.5%,理宗朝降至5%,到度宗朝则已无一人。在路一级的长官中,南方人同样居于优势。吴廷燮《南宋制抚年表》共载制置使、安抚使702人,除去籍贯不明的176人,移民及其后裔158人,占30%,南方人368人,占70%^[8]。其他官员中南方人同样也占有绝对优势。

高宗及其继承者后来之所以更加重用南方士大夫,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与抑制武人势力的崛起有关;二是与因地域差异而造成的政治态度不同有关;三是与社会基础有关。

3 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宋代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对南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批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北方的先进生产技术,使得南方优越的自然资源得到较为充分的开发和利用,从而有利于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首先,南方大量的荒地得到开垦和麦、粟的种植面积扩大。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劳动力日益增多,人均耕地则相对减少,只有部分南迁人口租种良田,其余的人只能转向荒山闲地进行垦殖。朝廷积极鼓励移民垦荒,贷给他们耕牛、种子乃至农具。在朝廷与移民的共同努力下,大批荒地得到开垦,尤其是两浙、福建和江南东西路。在江南地区,待一般的荒地开垦完毕后,人们又转向了湖泊、山坡等,从而开辟出大批围田、圩田、梯田等。

自古以来,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北方多种植麦、粟,南方多种植稻米。然而,在宋代,随着素以面食为主的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对麦、粟的需求急剧增加,麦、粟市场供不应求,价格飞涨。广大农户于是扩大麦、粟的种植面积。史籍记载:“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植,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10]四川地区也出现了“田土无不种麦”的局面。

其次,对手工业、商业的影响。宋代,由北方迁往南方的移民中,一部分是具有各种手工业技艺的专业人才,他们将北方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从而推动了南方手工业的发展。如陶瓷业,宋室南渡以后,便在南方设立了两座官窑,生产出来的瓷器的色泽、外观均与昔日北方定、汝、均窑瓷器相仿。再如丝织业,原在汴京织锦院、文绣院作坊工作的工匠,在南迁后也将这方面的技艺传到

了南方。除此之外,南方的印刷业、酿酒业等均受到北方移民所传入的技术的影响。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南方的商业迅速繁荣起来,尤以临安最为典型。史书中这样描述临安商业的兴旺发达景象:“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每清晨,两街巷门,浮铺上行,百市买卖,热闹至饭前,市罢而收...客贩而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等铺”^[11]。而其中的工商业者不乏北方移民,他们使南方的商业更加繁荣。

4 促进了南方文化的发展

文学艺术方面。宋代由北方迁往南方的移民中,不乏有著名的诗人,比如绍兴初年的陈与义、吕本中和曾畿。南宋词人中,有我们比较熟悉的李清照、辛弃疾等,他们以自己特有的风格称雄词坛。移民中的文人学士几乎都饱尝了战乱的巨大创伤,经历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这些不同寻常的经历,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创作源泉,对宋代文坛的文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陆游自谓:“我虽生乱离,犹及见前辈。衣冠方南奔,文献往往在。幸供扫洒役,迹忝诸生内。语言犹在耳,造次敢不佩。正是这种影响,才使他写出“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这样慷慨悲壮的诗句。

北宋时,汴京城中有瓦舍。“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意,易聚易散也。不知起于何时,顷者京师甚为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绍兴间驻蹕于此,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并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士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破坏尤甚于汴都也。其杭之瓦舍,城内外合计有 17 处。”^[12]汴京、杭州两地瓦舍中演的节目也多相同,如杂剧、诸宫调、参军戏、说书等等,其中的艺人也多为北方移民。

生活习惯、民俗风情方面。随着北方人口的南迁,南方人的生活习惯、民俗风情或多或少也受到了影响。历来北方人喜吃面食,而南方人喜吃米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方移民和南方土著人在饮食习惯上相互影响,最后“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13)。由于都城临安的食店多是旧汴京人开张,所以带来了北方的烹调技术。此外,北方的各种风味小吃,如甘豆汤、蜜枣儿、酪面等,都是在南宋传入杭州城的。

北宋时期,南北汉人服饰基本相同,后来,在内迁女真、契丹人的影响下,中原地区的汉人服饰逐渐被胡服同化。随着北民南迁,又将这些“胡服”传入南方。淳熙年间,袁说友在一份奏书中说到临安府的服饰情况,“衣冠服

制习为虏俗,官民士庶浸相效习,恬不知羞”^[14]。与此同时,南方妇女所用的一些化妆品,也是由北方传入南方的。

北民南迁,也使南方的民俗风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以杭州的变化最为明显。宋史专家张家驹对《梦粱录》所记载的杭州社会风俗与《东京梦华录》所记载的杭州社会风俗作了对比,说到:“几乎看不见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很大的区别。说明经过长期的糅杂之后,南北风俗已趋于融合。”^[15]在北方众多的民俗风情中,尤以节日风俗对南方的影响最大,如立春、端午、中秋、重阳、冬至、除夕等北方的节日都随着北民南迁而传入南方各地。

随着北民南迁,南方的文学艺术在变,民俗风情在变,其语言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史书记:“(杭州)城中语音好于他处,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16]杭州方言至今区别于上海、苏州等地的语言,可能正是深受北宋汴音影响的结果。有些地区的移民数量较大,且迁徙时间集中,以致移民的方言有可能取代当地的方言。如四川北部利州路,原来说的是蜀音,然而到南宋中期以后,由于来自陕甘地区的移民大量迁入,在语言上便出现了以秦音为主的变化,故当时人说到沔州的情况是“山犹连蜀道,人已作秦音”^[17]。据有关学者研究,从南宋中期开始,利州以北和大巴山以南的四川盆地北部,“蜀音和秦音相颀颀,同为当地的主要方言”^[18]。

[参考文献]

- [1] 脱脱.宋史(卷 23)[A].钦宗本纪[C].中华书局,1985.430.
- [2] [10] 庄绰.鸡肋编(卷上)[M].中华书局,1983.36.
- [3] 汪藻.浮溪集(卷 28)[A].王夫人墓志铭[C].中华书局,1985.
- [4]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 39)[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61.
- [5] 脱脱.宋史(卷 360)[A].赵鼎传[C].中华书局,1985.11293.
- [6] [7][14]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 88)[A].张浚奏议[C].(卷 145)李椿奏议[C].(卷 120)袁说友奏议[C].
- [8] [9]吴松弟.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165,160-168.
- [11] [12][13]吴自牧.梦粱录(卷 13)[A].铺席[C].(卷 190)瓦舍[C].(卷 16)面食店[C].
- [15] 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M].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60.
- [16] 郎瑛.七修类稿(卷 26)[A].杭音[C].
- [17] 祝穆.方輿胜览(卷 69)[A].引杨粹中诗[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8]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M].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518.

[责任编辑 宋占业]